

流动的课本和课本的流动： 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文化力

邓美英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课本是文化领导权的一种符号象征。编创与应用课本实现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无疑体现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文化自觉。流动的课本和课本的流动，在政治动员中提供多渠道传播和教育长远视角，一定程度克服赣闽等地方方言对政治动员带来的不利影响，为苏区广大群众从精神上消灭赤贫提供智慧源泉，将乡村道德水平提升到历史应有的高度，彰显文化启蒙及追求革命自由的文化创造。

【关键词】：中央苏区 政治动员 文本 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8）06-0140-07

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宣传效应已得到学界认可。作为一种文本，如何从历史阶段和文化记忆维度进一步探究其文本价值，需要更具体的微观视角。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1〕}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党员干部、红军战士、普通群众及少年儿童等不同动员对象，创编和发行多种革命课本或小册子。^{〔2〕}这些课（教）本内容深浅不一又各具特色，为中央苏区政治动员提供重要的学校文化传播与物质载体支撑，成为共产党人追寻自由解放的文化实践自觉。

一、流动的课本：文本编创与实物模型应用

中央苏区时期，各省、县、区苏普遍兴办各类学校、图书馆、列宁室、俱乐部、工农剧社等文化机构。正是这些正规或非正规的文化教育机构，适应战争环境和政治宣传鼓动需要，创编各类课（教）本并进行翻印、推广和普及，实践党对苏区文教事业的领导。

^{〔1〕}收稿日期：2017-03-11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动员中的课（教）本研究”（编号：13ZD3L01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中央苏区时期政治动员的分群分层研究”（编号：JD1433）；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研究”（编号：15DJ06）

作者简介：邓美英（1974-），女，湖南双峰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史。

石鸥：《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宣传效应》（《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小课本大宣传——根据地教科书研究之一》（《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吴小鸥：《试论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动员》（《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等）。

这些小册子小报和课本等按照严格标准，离现代教科书有很大差距，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宣传作用。党的文献曾这样记载：“在上海、广东，他们有一种小报，这种小报的效果是比较好些。”主要包括：提升理论修养和能力水平的党员干部课本、指导正规化技能训练的红军战士课本、进行宣传教育普及的普通工农群众课本，以及兼具革命启蒙和生活教育的少年儿童课本。（《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 年）》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6页）

（一）文字课（教）本创编应用

中央苏区课（教）本明显缺乏文本的规范性，远不如现代教育理念指导下创编的课本深刻。但现实生活就是最好的原创教本。根据收集的文献资料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课（教）本或小册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关于中央的决议、指示、命令、法令草案的汇编，或是对这些文件的解释说明。这类册子主要使用和教育对象是红军各级干部、地方苏区政府工作人员等。

第二类，各种通俗小册子，通常以纪念日为契机为宣传动员提供材料资源，主要针对广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群众进行各种知识性的概念解释和教育鼓动。

第三类，各种报刊，如《工农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红报》等，作为文本内容进行宣传动员，面向苏区所有党员干部、红军部队和广大群众。

第四类，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的教材，如《教育学讲义》《共产儿童读本》《国语读本》《常识读本》《红孩儿读本》《少先队游戏》《竞争游戏》《群众课本》《红军识字课本》《看护教科书》《苏维埃政权》《土地问题》等等。这类文本内容编写相对比较完整，可称之为真正的文本。以江西苏区为例，这类课本分类如下：

中央苏区时期江西出版的主要教材一览表²

办学层次	教材名称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小学教育	共产儿童读本（第一册）	1933 年 7 月	中央教育部编
	共产儿童读本（第二册）	1933 年 7 月	中央教育部编
	共产儿童读本（第三册）	1933 年 10 月	中央教育部编
	共产儿童读本（第四册）	1933 年	中央教育编
	共产儿童读本（第五册）	1933 年 7 月	中央教育部编
	共产儿童读本（第六册）	1933 年 7 月	中央教育编
	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国语读本（第一册）	不详	湘赣省苏文化委员会出版
	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国语读本（第二册）	不详	湘赣省苏教育部出版
	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常识读本（第四册）	1933 年 8 月	湘赣省苏教育部出版
	红孩儿读本（第一册）	1930 年 5 月 30 日	湘鄂赣边境工农兵暴动委员出版
	竞争游戏	不详	中央教育部编
	少先队游戏	1934 年 4 月 8 日	中央总队部总训练部编
	儿童游戏	1933 年 10 月 4 日	湘赣省儿童局翻印
	儿童唱歌集	1933 年 5 月	中央教育部编
社会教育	工农读本（第一册）	1932 年 10 月	赣东北省苏文化委员会编订
	工农读本（第二册）	1933 年	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编订
	工农读本（第三册）	1933 年 3 月 2 日	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编订
	工农读本（第四册）	不详	闽浙赣省苏文化部编订
	工农兵三字经读本	不详	不详（录自会昌县博物馆）
	夜校识字班教材和宣传材料	1934 年 7 月 26 日	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印

²图表内容根据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第七册及《红色中华》等书刊资料整理。

办学层次	教材名称	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
红	识字课本	1931年2月	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出版
军	红军识字课本（第一册）	1934年3月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
教	红军识字课本	1932年4月15日	闽粤赣军编
育	红军教育与管理	1932年1月15日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印
	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儿童团讲授大纲	1933年5月	中央教育部编
干	苏维埃政权（全一册）	1933年11月19日	中央教育部编
部	土地问题	1933年11月13日	中央教育编
教	算术常识（全一册）	不详	教育人民委员部编
育	自然常识	不详	教育人民委员部印
、	理化常识	1933年11月	教育人民委员部编
专	地理常识	1933年11月	教育人民委员部编
业	生物常识（全一册）	1934年4月	苏维埃大学编
教	农业常识（上、下册）	1934年6月	中央教育部印
育	看护教科书（第一册）	1934年6月22日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发行
	看护教科书（第二册）	1934年6月30日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发行
	看护教科书（第三册）	1934年7月12日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发行

仅从书目名称看, 以上各类课本, 体现着“首先是政治文本, 其次才是教学文本”的鲜明特色。^[2] 作为政治文本强调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 而作为教学文本则强调知识传授与生活体验, 两者的初步结合, 进一步启蒙和吸引着底层民众。

（二）实物模型展示

随着苏区教育事业的兴旺, 文博事业也因陋就简建立和兴起。从苏区各地征集的文物和模型, 分门别类, 有红校模型室、农产品展览馆、革命博物馆等。

实物模型在红军学校发起创建, 主要包括军事上的战术图解、兵器模型和各种战利品, 政治上的组织图表、工作条例、知识挂图, 以及各种文化常识课上的仪器, 如化学药品、物理仪器、生理模型和图解等等。实物模型展品栩栩如生, 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体现红军教育的三个原则, 即从切身问题说起, 然后再说到远的问题; 从现在的问题说起, 然后再说到必须要知道的过去历史的问题; 从具体问题说起, 然后再说到抽象问题。^[3] (p215) 各种展品让广大群众和红军战士眼界大开, 精神振奋。“成群结队的绵绵不断的人群像洪流一般的涌上前来, 把模型室及俱乐部前面所有的空地都站得一个水泄不通”。^[4] 尤其是苏区妇女们, 由于受教育机会少, 在看到实物展览中出现的旋转门之类的东西, 好奇心随起, 参观兴趣和学习热情大增。

一切新奇的事物就是最好的教育材料。它们是活物而非静物, 是活教本而非死教本。贴近现实生活的实物模型, 加深了政治文本一贯强调的阶级意识。两者的结合, 非常巧妙地把革命战争环境中的阶级话语转化为日常生活实践, 为中共后来构建革命话语体系提供较为系统的文本资源和实物支撑。

二、课本的流动: 战斗中的动员学习

战争频繁, 打仗东奔西走, 居无定所, 军民学习教育也就没有固定的场所。流动训练班成为现有条件下提高战士和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一种形式。在战斗中学习, 在学习战斗中, 课本的流动贯穿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全过程。

（一）怎样去办流动训练班

办流动训练班，是在教育资源极度缺乏的客观条件下而迫不得已的一种办学形式，也是中央苏区各地在教育领域实现的一种颇有特色的动员形式。服务对象主要是新战士和加入共青团等组织的青年劳苦群众。

至今能完整看到有关流动训练班的教本不多，其中《怎样去办流动训练班？——供给各级党部办流动训练班的材料》是江西省瑞金县下肖区办流动训练班总结经验后提炼出的培训材料。^[5]该文本内容详细，有可操作性，为各地办好流动训练班提供经验参考，成为流动学习训练的范本。

教本首先突出了流动训练班的组成、受训时间地点和训练准备工作等具体内容。如组成人数少则8人，最多不超过20人，并确定小组负责人；训练班每个课务（如支部工作，党员须知，扩大红军等）分2-6次教完，每次最多2个小时。训练时间一般在驻地中心的夜晚或根据当地工作情形安排。第一次上课需要做足准备工作，如调查训练班同志的年龄、党龄、成份、文化程度，训练班同志在当地的处境、斗争历史、现在工作情况、斗争情绪，从而将所教的课程与实际情形配合起来讨论。其次，教本强调如何进行问答式的教法。在问答式教学过程中，如果受训同志出了错，不能打骂，要学会讨论式批评。最后，教本强调流动训练班教育委员会职责与任务：为保证流动训练班一期一期顺利举办，须成立以宣传科长为主任、训练班的各教员、办训练班的支部和教员干事组成教育委员会。每期训练班必须具体讨论授课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人数的规定与分配，在举办时须检查一次，纠正错误，发扬好经验。办完一期后要总结并讨论第二期工作，以便继续举办下去。

流动训练班为了更能适应短期教育目标的需要，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课（教）本统一进行，而是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如每年红五月征收团员后，专门在课前指定识字的团员将教本材料读给不识字的新团员听。新团员流动训练班主要采用材料有《共产青年团是什么》《团的纪律》《支部生活是什么》《怎样去健全支部生活》《团怎样去领导群众》。^[6]（p307-308）这些内容印成教本后，以大纲形式讲给新团员听，内容凝练，教育目标明确，能在短期内使被教育者迅速接受新知识。课本在流动训练班，从无到有，由浅入深，适应了中短期的流动教学目标。

（二）一边战斗，一边学习

残酷军事斗争催生着各种战争文化。战争推进中央苏区群众学习多种战争文化知识的必要。如敌人在战争中使用的毒瓦斯是什么？无线电是什么？十月革命是什么？如果不宣传，不教育，不解释，群众一无所知。政治动员把上级的命令及时传达，开会是一种方式，但是在会上并没有专业人士进行详细而通俗的解释、教育，群众仍然一无所知。《红色中华》第127期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专题刊载了“加紧战争动员加紧防空防毒来回答白色恐怖”“催泪毒瓦斯防御法”等内容，较为详细地向广大群众介绍了催泪毒瓦斯的毒力，如何防御、驱除，以及中毒后如何医治等内容，很好地做了防空防毒动员的宣传与解释。^[7]这些材料汇编后，在战斗间隙的零散时间，成为战士、群众、基层干部们学习的“规范”教本。

等斗争局面稳定后，苏区腹地“先后开办列宁学校，训练班，以及特委苏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发行各种革命的教本《工农兵读本》《劳动读本》等”。^[8]（p355-356）受过一些专业训练和教育之后，红军战士水平显著提高。红军学校毕业的学生，“起码可当排长”，“供给三军干部很多”。^[9]（p174）虽然他们的成分仍然多系农民，但因为素质和能力提高了，可以胜任部队的职务。如在粉碎第三次“围剿”之后开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生可以马上下部队独立工作，如“在宁都兵暴胜利红军第五军团成立时，曾调出学生数十人到五军团充任连政治指导员”；^[10]第二期学生政治教育全面，“在军事方面，学习新的战术和技术，包括炮工科学”；^[11]第三期学生毕业“人数是一千人以上”。^[12]此外，临时中央政府专门举办了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其中第三期毕业学生“共四十七名”，“毕业后，即派回各县工作”，^[13]成为地方苏区革命的绝对骨干。

“边学习，边战斗”，把课本的内容流动在解决苏区革命和农村现实问题基础上。这种有针对性的学习与实践，极大缓解了革命最迫切需要解决各类问题所产生的矛盾。比起单一而系统地学习课本理论知识，这种教育方式更适合苏区农村社会教育

的现实需要，学习效果也佳。它是传递亲情的情感纽带，拉近军民的认知情感和教育学习距离。以流动的家书成为一种动员教本之时，承载着战斗与学习的双重动员任务，表达着更深层的革命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三、流动的课本和课本的流动：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文化力

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指出：“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14] (p248)}自由绝不能贬为中下底层人的偏见，自由是革命的价值旨归。自由哪里来？苏维埃政权主导下的课(教)本，作为政治文本、沟通文本和知识文本，激发起苏区群众追求自由解放的认识自觉和实践自觉，初显中共在文化上的自觉创造。

(一) 凸显中国共产党人追求革命自由解放价值

只有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自觉，才能有通向自由大道的可能。而文盲居多的中央苏区群众要迈出自由脚步却显得异常艰难。没有文化，乡村苏维埃政权无法布置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不识字，红军部队的训练和战斗力无法提高。革命意识、文化知识、工作任务等都需要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组织和人员分解、传递、沟通、交流和实现，而课本编创者和他们手中的课本恰恰承载着这样的责任和使命。

即使条件极为艰苦，群众又有畏难情绪，临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级苏维埃主动行动，想尽一切方法编好教本，大力发动地方苏维埃政府翻印课本。1931年，闽西苏维埃筹办闽西列宁书局，出版《共产主义》《共产主义ABC》《识字课本》《社会主义浅说》《看图识字课本》《列宁小学课本》《革命歌曲选集》等教科书。^{[15] (p193)}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编印全六册《共产儿童读本》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文化部编印全四册《工农读本》是最为典型的学校教本。1932年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令，要求识字程度稍高的人员成立读书班，“用中央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例等及《红色中华》为教材”，^[16]以适应战争需要，提高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自编自创的课(教)本，努力与文盲斗争，把不识字看作是“一个人最吃亏而又最可耻的一件事”，^{[17] (p363)}对普通工农提出能识字的基本要求。

在条件更为艰辛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想方设法找材料创编简易课本帮助不识字的红小鬼识字，来提高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据老红军蔡日轩回忆，1935年11月，红二方面机枪连在一个土豪家里收缴了一卷马粪色的窗户纸，任弼时知道后，当即指示把这些纸除留一部分办公外，都用来印识字本，并把自己行军途中编好的课文交给参谋去刻印。这就成了行军途中珍贵的“识字本”。课本内容有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建设新国家的儿歌、短诗，有中国地理知识，红军历史故事，还有几幅简明的插图。从此，红小鬼开始慢慢地识字了。^{[18] (p332-333)}就是靠着这样简陋的条件和不懈的坚持努力，中央苏区的简陋课本走上了长征之路，走进了普通战士的心中。

中央苏区国民教育运动的开展与深入，广大苏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信仰，中央苏区各地“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到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这种教育产生出的显著效果也被国民党认同，“鲁胖子电蒋谓赣西南……较之白色区域资产阶级的学校和一般所谓提倡义务教育平民教育的先生们喊了十几年没有半点影响，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8]革命最具意义的成就便是群众在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就政治文化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对政治制度认同的范围和程度更为重要了”。^{[19] (p255)}正如斯诺所言：“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20] (p52)}当国共两种政治力量展开民意力量选择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价值就形成了有利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在农村孩子身上发挥出的持久力，从长远来看极富价值。正是简单的小课本说出的小道理，承载着持久的大价值。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在教育方面下的大力气终于开花结果。

(二) 克服方言障碍，提供政治动员有效文化传播载体

课本政治动员，为外来干部传播革命思想，克服方言障碍产生的不利影响，提供有效的文化传播与沟通载体，完成有时言

语无法沟通的任务。此时革命课本如“沉默的语言工具”，充当连接沟通与传播的中介。

众多外乡革命者来到中央苏区进行革命宣传教育，人生地不熟。首先面临着语言交流的极大障碍。方言阻挡着政治动员的进一步深入。以赣方言、客家方言等主要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中央苏区，一般都远离中心城市，地处偏远山区，每一县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差距，甚至有些地方隔村都不同语。初来乍到的同志面临很多的问题，无法深入工作和深入动员。“我们是外县人，不懂话无法进行妇女工作”。^{[21] (p217)}在新泉，“配合独立三团行动时，三团的红色战士多是龙岩笪[籍]，与模范队员语言不通。由此，就产生一种狭隘的地方观念，形成派别观念，放松了[对]模范队的领导，及教育训练管理”。^{[22] (p27)}又如红军人漳州时因“听不懂本地话”而出现把穿西装、戴眼镜的华侨当作土豪乱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23] (p8)}“有的地方，因言语不同，红军被打死无人料理”。^{[24] (p360)}语言障碍，极大隔阂着革命思想的进一步交流与渗入，也阻挡着外来革命者的动员行为介入。

于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资源与教育资源被进一步挖掘出来。首先利用中共高层顶层组织优势，就地取材作为课本动员材料。中央及省军委所发的训令、通令、法令、条令等及报刊作为教材。其次是发挥外来知识分子能写会编的文化优势，带动地方干部创编课本或小册子，进行教育动员。因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当地多为有知识的人，会讲地方方言，了解地方风俗和传统习惯，与当地群众沟通比较方便，这样通过县、乡甚至是村一级的地方领导者的发动和联系，号召和带动当地群众开展识字运动也就更为容易些。需要在乡村哪里树立识字牌，读些什么样的识字课本，接受识字运动思想上还存在什么顾虑和要求等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能更有效提高广大苏区群众认知能力和阅读水平。最后，编写课(教)本时突出教本内容的乡土特色，与乡村社会文化传统连接起来。“农村各处，布满了苏维埃的政纲布告，宣言，传单和标语”。^[9]对于有了初步识字能力的群众而言，简单的标语，通俗的小册子，识字课本，政府发布的文告和简易课本充当起政治动员的文化传播载体。

在人人接受识字运动，学会阅读的教育环境浸染中，苏区群众头脑中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方言。课(教)书承载的学校文化传播，具有仪式化特征的政治语言，将中共政治主导下的价值观念具体化、日常化，逐渐渗入苏区群众的普通生活。中国共产党创编的布告、标语、宣言等形式简单的各种非正规课本，以无声的语言和更易被接受的话语达到有效动员群众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

(3) 普及文化知识并倡导文明生活方式

课本政治动员，在落后乡村地区普及了文化知识，倡导文明生活，从而逐步提高苏区群众的道德水平，为之社会化产生深远影响，使之获得良好的精神持久力。课本成为思想传播的有效载体。

“粗人”“乡下佬”“蠢家伙”这些字眼曾是工农劳苦群众的身份符号。在他们获得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后，发现卑微与贫困不是与生俱来的。从知识获取的过程中，他们懂得强加在身上的苦难也是可以去除的。当懂得这样的道理之时，也是他们信仰的树立和基本文明生活的开始。此时，是精神的力量战胜了一切。在乡村，他们仍然忍饥挨饿，经常处于生活的贫困状态，“人生不过是经年劳累、穷困、缺乏安全和饱受欺凌”。^{[25] (p291)}无疑，频繁的战事，缺衣少药成为家常。持续战争环境带来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等物质的匮乏，苏区群众努力通过自力更生逐步在克服。可是，当贫困“不止是被剥夺，而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之时，非人化力量控制的卑污必须依靠精神与思想的力量去取胜。群众性的普遍识字初步改变了这种非人化的力量支配。通过问字所、识字小组、识字班、读报团、夜校等方式的扫盲，广大群众能够识字、读报和看懂政府文告，进行自由阅读，初步解除着贫困对他们肉体的直接支配。^[14]

苏区群众向往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苏区课(教)本一直倡导着这种文明生活的方式，“儿童反对烟赌”“垃圾倒在那里”“打儿童是不对的”等内容，对儿童健康生活成长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们常常将课本的内容付诸行动。“农村吸鸦片和赌博的现象很普遍，不少人深陷其中，加之落后闭塞地区的宗族势力大，关系错综复杂，成年人很难自己摘除这颗毒瘤”，^{[26] (p71)}而儿童以自己获得的教育启蒙方式，天不怕地不怕，对封建毒瘤展开战斗，所向披靡，战果累累。

对日常生活内容的关注，使中央苏区课本承载着普及文化知识及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的思想价值。当时苏区很火红的话剧《不识字的害处》，便是通过错把“忙”写成“亡”引至虚惊一场的剧情，通俗地向农民们说明没有文化、不识字和不会写字的苦处与害处，动员群众不但让子女、自己也要积极学文化。苏区在保证群众享受教育权利方面，确实是下了很深努力的。^{[27] (p121)}据老红军彭富九回忆：“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办列宁学校，许多无钱上学的孩子进了学堂，尤其是农村的女童，她们破天荒地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26]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8] (p610)}随着苏维埃革命在中央苏区各地的深入，妇女主动接受文化教育，进半日学校、夜学、俱乐部、识字班或列小学习。劳动妇女作为革命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获得苏维埃政权的身份认同。

中央苏区广大群众通过识字运动和专业学习获得各种认识和实践能力，改变着赤贫在群众精神上的持续状态。这种脱贫的精神获得，进一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着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能力，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传统，使他们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到战争和阶级斗争中，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29] (p68-69)}

四、结语

中央苏区课本动员的文化力，首先是作为政治文本，对党员干部、红军士兵、普通工农、儿童等群体进行教育与宣传，动员他们参与革命。苏区广大群众的服从和配合，为战争条件下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实现政治决策规定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同时也展示当时中国社会多种政治制度并存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发展历史过程。其次，作为沟通交流文本，克服着地方方言横亘在政治动员面前的重要障碍。中央苏区创编发行的各类课本、小册子和各种标语，具有乡土特色的白话语言，刊印生动有趣的漫画，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承载深刻道理，与乡村社会传统文化连接起来。最后作为承载知识生活文本，课（教）本为广大群众获取多种认知和实践能力提供具体物质形态，逐步改变赤贫在群众精神上的持续状态。随着旧有的思想习惯传统被打破，广大苏区群众被革命吸纳，逐步参与到苏维埃各方面建设。课（教）本尤如无声的语言在苏区群众内心长久持存。

课本动员的文化力不像党和政府发布命令那样具有疾风暴雨式的直接效果。课本渗透的价值观一旦在苏区群众内心生根，日后定会开花结果。革命年代课（教）本承载的精神、价值、符号，直至今天未曾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课本，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现代化条件下的各种课本类型多样，内容更为深刻，为提高当前国民素质提供深入的路径，更应承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教育动员之责。

参考文献：

- [1]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N]. 人民日报, 2013-7-14 (1) .
- [2] 石鸥, 刘学利. 教科书文本内容的构成[J]. 教育学术月刊, 2013, (5) .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1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4] 红校模型室开幕记[N]. 红色中华, 1933-5-5 (2) .
- [5] 怎样去办流动训练班? [N]. 红色中华, 1933-10-18 (4) .
- [6] 福建省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1 辑) [G]. 内部刊印, 1986.
- [7] 红色中华[N]. 1933-11-12 (1) .

-
- [8]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9]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江西党史资料·十万工农下吉安(第7辑)[M],内部刊印,1988.
- [10]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N].红色中华,1932-1-27(7).
- [11] 第二期学生毕业盛况[N].红色中华,1932-5-25(5).
- [12] 中央红军第三期开学[N].红色中华,1932-6-9(4-5).
- [13] 苏维埃工作人员第三期训练班毕业[N].红色中华,1932-6-16(5).
- [14]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5]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闽西革命根据地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16] 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N].红色中华,1932-3-2(6).
- [17] 方志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任弼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9]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20]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 [21] 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江西妇女运动史料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22] 古田会议纪念馆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1933年1月-1934年12月)》第8辑[C].内部刊物,2006.
- [23] 福建省龙溪地区中共党史研究分会.中央红军攻克漳州资料选编(下)[C].内部刊印,1982.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5]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M].梅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26] 李树泉.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4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 [27] 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9] 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1卷)[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1981.